

历史纪录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建构、审美转译与认同生成

赵安然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历史纪录片作为二十一世纪影像文明在中国语境中的重要衍生形态，在保存历史痕迹、传播民族记忆与重塑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伴随媒介技术的迭代与受众审美的发展，以《书简阅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苏东坡》等作品为代表的中国历史纪录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呈现出新的活力。本文围绕历史文化记忆建构、审美范式转译与文化认同生成三条主线展开论述，旨在揭示历史纪录片是如何通过影像机制激活被沉积的传统文化基因，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完成意义再生产。

【关键词】：历史纪录片；传统文化；文化认同

DOI:10.12417/3041-0630.26.02.089

在二十一世纪影像文明蓬勃发展的中国语境下，历史纪录片作为承载民族记忆、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形态，正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引发广泛关注。历史纪录片不仅在保存历史痕迹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更揭示了在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建构集体记忆与重塑文化认同等层面的深层价值。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迭代与受众审美需求的不断升级，中国历史纪录片在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中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形成了兼具历史深度与美学高度的独特创作范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当代传承与创新始终是学术界与实践领域关注的核心命题。本文以历史纪录片为研究对象，围绕文化记忆建构、审美范式转译与文化认同生成三条主线展开系统论述。通过分析影像符号的编码逻辑、叙事结构的时空组织以及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创新，旨在揭示历史纪录片如何通过影像机制激活被沉积的传统文化基因，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完成意义再生产。

1 历史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建构

1.1 影像符号整合传统文化记忆资源

文化记忆通过可感知的视觉符号系统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的视觉转译。在影像叙事中，器物、遗址与文献被转换为视觉、听觉与语言多维度的符号链条，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信息的聚合与再释。历史纪录片通过“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语言符号”的分层编码逻辑，将抽象的价值观念置入具象的文化标识，引导受众在多重感官刺激中完成对历史事实的情境化理解。例如《如果国宝会说话》，该片通过微观叙事策略，将青铜器、陶俑、简牍等文物进行激活转化成为充满文化记忆的视觉符号。在第七集《良渚玉琮王》中，特写镜头聚焦玉琮表面的饕餮纹饰，通过4K技术呈现细密刻纹与抛光玉质的质感，不仅还原了器物的工艺细节，更通过画外音对“神权与王权合一”的解读，唤醒观众对良渚文明中祭祀传统的情感联想。这种“从历史符号到真实情境再到文化记忆”的三阶互动，实质是借助了

“能指—所指”的双重结构，将文物从历史标本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触发器。历史纪录片中的物质符号属于拉康理论中的“现象界”，通过可触可感的客观存在，为文化记忆的系统性建构奠定了感知基础。在听觉符号层面，《书简阅中国》采用“书信吟诵+环境音”的复合设计，将汉代简牍中的家书文字转化为带有情感韵律的声音符号。当配音演员以略带方言腔调的语调念出时，背景中穿插的汉代现实生活的车马声、叫卖声，这种市井音效共同构建了沉浸式的听觉场景，使观众在声音符号的引导下“穿越时空”完成对汉代家庭伦理的记忆唤醒。《书简阅中国》中的这种视觉符号触发认知理解，听觉符号强化情感卷入，真正做到了通过书简来“阅”中国，体现出强大的见微知著的观史能力，共同推动文化记忆的层级建构。

1.2 叙事结构复原历史语境与文化脉络

在影视符号触达文化记忆之后，在宏观结构上编织历史脉络成为决定记忆成效的关键。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认为，在故事层面制造悬念和惊喜可以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苏东坡的词句和故事人们并不陌生，创作者通过倒叙悬念结构，既增加了收视兴趣，也使得苏东坡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苏东坡》在六集框架中呈现诗人一生的情感跌宕与心态起伏，通过人物命运加时代风云的双重视角，实现了个人的人生历程与时代历史的镜像互证。全片在宏观时序上遵循北宋政治格局的发展脉络，在微观层面则以东坡词、书法、绘画与美食故事作为叙事节点，既满足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又保留了细节的温度与张力。这种叙事策略暗合了热奈特的叙事时间理论，通过“事后叙事”与“事前叙事”的灵活运用，打破线性时间的局限。例如，在讲述“乌台诗案”时，影片先以现代学者解读《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画面切入，再通过水墨转场回溯1079年的御史台狱场景，使观众在“今—古—今”的时间跳跃中，完成了理解诗词文本与历史事件的互文关系。《苏东坡》历史叙事通过“结构交织—听觉共振—视觉再现”的三位一体策略，

将历史事实与诗意表达熔铸为有机整体,避免了传统历史纪录片中“资料堆砌”的弊端,在“事件链”与“情感链”之间实现了张弛有度的情感释放。《河西走廊》的叙事结构也是如此,该片以张骞出使西域的主线串联起丝绸之路的商贸、宗教与战争史,同时通过“现代考古发现—古代事件还原”的双线叙事,在汉武帝的政治雄心与戍边士兵的家土乡愁之间建立情感呼应,使宏观历史脉络与微观个体体验形成记忆共振。这种叙事结构不仅复原了历史语境,更通过情感线索的植入,强化了文化记忆的情感黏性。

1.3 个体观看促发集体文化认同生成

当影像叙事进入受众视域,个体观看行为便成为文化记忆升维的起点。《书简阅中国》通过书信文本的人格化呈现,让观众得以贴近古人情感世界,在私语般的吟诵与沉浸式场景间建立情绪通路,从而在“自我—他者”的同构体验中实现记忆共享。在B站平台,《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弹幕互动呈现出典型的记忆再生产特征。当观众看到“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记录的秦代律法条文时,弹幕中涌现出“原来秦朝就有环境保护法”“和现在的法律精神相通”等评论,这种跨时空的意义阐释,实质是个体将历史符号与当代经验进行联结,进而形成新的集体记忆共识。

该片在YouTube平台推出英文字幕版后,一位美国观众留言:“虽然不了解宋代历史,但苏东坡在逆境中的乐观让我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这种跨文化的意义阐释,表明历史纪录片通过个体情感共鸣,能够超越文化壁垒,在国际语境中催生出新的集体记忆形态。文化符号因其象征性与普遍性,能够在公共领域形成高频共识,进而建立跨群体的符号联结网络,历史纪录片正是借助这一机制,实现了文化认同的层级跃升。

2 中国审美的影像化转译

2.1 写意美学理念融入影像表达范式

“写意”作为中国艺术传统的核心范畴,重神似而轻形似的价值取向为历史纪录片提供了超越再现的审美支撑。“写意之美”阐释了历史纪录片在古典美学与当代影像技术之间的对话机制,创作者通过意象凝练、意境营造与情景交融,实现了影像纪实与抒情的平衡。在《书简阅中国》中,片头采用水墨动画与CG特效交织的方式,展示书简漂浮于山水之间的诗意意象:毛笔笔触勾勒的竹简在动态光影中若隐若现,配合“墨分五色”的晕染效果,既保有传统书法的笔触韵味,又通过运动轨迹赋予静态文字以生命动势,体现了“虚实相生、动静互补”的写意精神。这种视觉表达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美学转化为影像语言,当镜头掠过空白竹简时,画外音以“空白处是未写的千言万语”进行阐释,使观众在“可见”与“不

可见”的张力中感受东方美学的含蓄特质。《敦煌·生而传奇》中的飞天场景则是写意美学的另一种实践。该片没有机械复制壁画中的飞天形象,而是通过动态捕捉技术,让舞者身着飘带演绎“吴带当风”的韵律,配合光影渐变的背景,使静态壁画在影像中获得“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这种写意表达并非对历史的背离,而是通过“以形写神”的中华美学,更深刻地传递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2.2 纪实性与诗意性实现叙事融合共生

中国历史纪录片一直存在着“史实资料再现”与“审美升华”之间的平衡问题。《本草中国》中表现为“药材特性—文化隐喻”的双重叙事。该片在拍摄“人参”章节时,既通过显微摄影记录人参皂苷的分子结构,又以“七两为参,八两为宝”的民间谚语,将药材的物理属性与文化象征结合。在真实性前提下数字技术的运用实现文化符号的深层表达,4K镜头下人参须根的纹理细节,与中医理论中“根脉相连”的哲学观念形成互文,使纪实影像成为诗意表达的载体。《河西走廊》的音乐设计则体现了听觉层面的纪实与诗意融合。作曲家雅尼为该片创作的主题曲《河西走廊之梦》,采用杜杜克笛演奏,苍凉音色与丝绸之路的广袤地貌形成听觉到视觉的通感效应。当镜头掠过沙漠骆驼时,音乐中的微分音处理模拟了风沙呼啸的质感,既纪实性地还原了地理环境,又通过旋律线条传达出“大漠孤烟直”的诗意意境,实现了声景到情境再到心境的三重共鸣。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先进的技术、高超的手法,而是主创对古代文化的通透体会、对文人生命经验的深刻体察、与自然神交的切身体验,与镜头下的人与物的心心相印,以及把自己的心完全交付给纪录片的赤诚。

3 文化认同的生成与传播

3.1 共情叙事推动观众身份与情感认同

历史纪录片的叙事方式从宏大叙事向平民叙事转向,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观众身份认同的情感通道。创作者通过个体化的生命故事与细腻的情感细节,降低了宏大历史叙事的距离感,提升了受众的情感共鸣。《书简阅中国》中的“秦朝黑夫家书”章节没有直接讲述秦代兵役制度,而是通过黑夫在信中“愿母买丝絮为我制夏衣”的日常诉求,让观众从家庭伦理视角理解秦代士兵的生存状态,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历史从遥远的教科书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在《苏东坡》中,共情式旁白与多声部音乐建构出立体情境。在讲述苏东坡在黄州耕种时,旁白以“他把苦难踩进泥土,长出稻穗”的诗化语言,配合大提琴与竹笛的对位演奏,将政治失意转化为生命韧性的审美表达。观众在此体验的不仅是历史认知,更是通过音乐与语言的情感共振,完成对“逆境超越”精神的身份认同。这种叙事策略通过“听觉共振”与“视觉再现”的协同作用,实现了历史纪录片的共情建构。

3.2 共享记忆构建历史与文化共同体结构

文化认同的深层机制在于对共享记忆的持续阐释与再生产。文化符号因为典型性与象征性的特点，能够在公共领域形成高频共识，进而建立跨群体的符号联结网络。历史纪录片通过不断强化器物、文本与场景三类符号的象征意义，为“想象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化与情感化的双重支撑。《故宫》系列纪录片对“太和殿”符号的持续阐释极具代表性。“新世纪以来《故宫》《探秘紫禁城》以及《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故宫题材的历史纪录片受到关注。这类题材纪录片的观众，具备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储备，他们通过调用自身知识积累对纪录片的意义进行文化解码。在此过程中，观众与纪录片创作者达成视界融合，在文化认同的层面实现认知共情。”《敦煌》的跨媒介叙事则拓展了共享记忆的传播维度。该片除电视纪录片外，还推出VR虚拟展厅、敦煌壁画临摹APP等衍生产品，观众可通过数字技术“参与”壁画修复过程。这种“观看—互动—创造”的闭环设计，使敦煌文化从影像符号转化为可参与的记忆实践，正如阿斯曼所言，文化记忆需要“仪式性的重复”来维持其生命力，历史纪录片通过技术赋能，为这种重复提供

了新的实践形式。

4 结语

历史纪录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建构、审美转译与认同生成，是一个由符号编码、叙事组织、审美创新到传播阐释层层递进的过程。通过影像符号的系统整合与写意美学的现代转译，传统文化在数字影像中获得了新的感性维度；通过情感共情与跨文化传播策略，历史记忆被再次激活并外化为群体文化认同，进而国际语境中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历史纪录片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媒介融合路径，探索互动式叙事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在文化记忆再生产中的应用，以期拓展历史纪录片的叙事边界，推动传统文化从“被记录”向“被参与”的范式转变，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持续活化与全球共享。历史纪录片的本质，在于通过影像媒介让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代社会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当《如果国宝会说话》中的青铜器在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红文物”，当《苏东坡》的诗词在海外课堂引发跨文化讨论，这些现象印证了历史纪录片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深层价值，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传统的转译者与认同的建构者，在影像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书写着中华文明的当代篇章。

参考文献：

- [1] 张振.微观跨国史视角与艺术形式复魅:《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与影像叙事[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5,(01):18-30.
- [2] 姚天鹏,胡逊.跨文化视域下中国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策略[J].传媒观察,2024,(S2):38-42.
- [3] 裴悦.中国历史纪录片的叙事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D].闽南师范大学,2024.
- [4] 崔莉.论历史纪录片的真实与文化想象[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11):106-114.
- [5] 王强,裴悦.有情的历史:历史纪录片的共情传播[J].当代电视,2023,(09):79-84.
- [6] 孙炜钰.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历史记忆构建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3.